

改革战车如何告别“不挂档空踩油”

毕诗成

岁末盘点时,发现大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有很多项改革太不给力了。不管是收入分配改革、教育改革、公车改革,还是税收减负、新拆迁条例、官员财产公开,很多道理早就说滥了,该怎样不怎样都讨论八百来回过了,可每每总是“只闻楼梯响,难见下楼人”。经济学家张维迎最近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描述:利益多元化,大家自己玩自己的,不挂档,只踩油门,听起来轰轰烈烈,但没挂档它不住前走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改革的状况。

这的确是当下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命题。它最让人担忧之处在于“不进则退”的逻辑,正如一本叫《中国世纪》的书中所

写到的:中国模式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带着问题超速前行。这是和时间赛跑的一场角逐,看究竟是前进的速度克服了问题的扩散,还是问题的障碍绊住了前进的脚步。当下很多东正建立于30多年来民生极大改善基础的之上,如果不能通过深入改革继续同民众分享成果,矛盾与负面情绪就可能凸显出来,让社会增加变数。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焦虑。比如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就很是着急,他撰文说,中国急需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这场社会进步的目标,就是为了避免一味追求数量增加的发展走火入魔,缺少了方向感;其核心内容就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不管是孙教授所言,还是充斥于媒体时评版面诸如“公车改

革”之类的具体呐喊,都体现了同一个求稳时代大家对于变革的渴求。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于是我们想到了温总理今年多次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于,这显然还不是所有掌权者的共识,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已异常顽固;改变结构性权力空间,也绝非朝夕之间。目前最大的障碍,是很多搁浅、缓慢的改革,都不知道它是在哪个环节、因什么问题而减速甚至搁浅的——有人解读说是因为触及既得利益者,比如公车改革;有人解读说是因为不同部委之间利益无法协调,比如收入分配;有人解读说是利益集团公关的结果,有人解读说改革时机还不成熟……说什么的都有。原因五花八门,结果却是一个,舆论高声嚷嚷不依不饶,改革战车空踩油门按兵

不动,社会就是这么“纠结”起来的。

365天之后,当我们站在2012年的门槛里回望时,还是会有同样的改革纠结吗?现在虽然不敢断言,但有多少期待,却是冷暖各知。这就像我们如果往后看365天,2010年初的时候,有多少触及改革的话题,和当下其实是否有着同样的语境?到底应该怎么办?换个说法,既然中央领导一再表态要推进改革,接下来的改革,到底怎样才能挂档?

或者,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到底谁来“挂档”的问题。缺少改革发动机,没有部门专注于推动改革,确实是个不小的困境。一般我们会把发改委理解成“发展改革”的部门,但问题正如学者所言,发改委现在更多专注于分配资源,分配项目,对于跟人吵架触动既得利益的努力,显然缺少了点兴趣。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上,张维迎呼吁说,应该重建体改委。综观当下中国改革大局,这或许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如果说以往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大家都不清楚怎么走,主要强调探索的话,那么现在则是大家基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只是纠结在推动力上,或者说在于打破某些部门“假装摸石头”的假寐上。其实在近年的两会上,也不时有代表、委员提出,国务院应该重新设立体制改革委员会。这种情绪来源于群众一直反映“住房难、买房贵;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买药贵”,可改革久突不破,成果不大的现实之上。只有设立相对独立的体改委,走出部门抓改革难以摆脱部门利益掣肘的误区,中国的改革才能获得新的突破。

冰点时评

坏制度设计挡住朱清时,挡不住天价U盘

曹林

近来政府采购腐败的丑闻似有井喷之势,媒体已接连曝光好几起。先是辽宁抚顺财政局采购苹果手机最前沿的娱乐产品iPod Touch 4当U盘,网友感慨说“iTouch 4市价大约2300元,他们买了7个当U盘使,好贵的U盘”,市场上最贵的U盘不过才1099元!然后黑龙江省公安厅电脑采购清单中出现4.1万元超配购置笔记本电脑,再就是乌鲁木齐一法院采购豪华电动按摩椅等等。政府采购把纳税人的钱当纸,舆论惊呼“阳光采购”变成了“阳光腐败”。

看到这一系列采购腐败,不由想起正在筹办南方科大的朱清时院士的遭遇,在他的遭遇中,“阳光采购”则完全扮演着另外一种角色,成为改革者做事的障碍,僵化的行政程序让改革者寸步难行。

朱清时是在媒体报道“南方科大陷入滋生困境”后,以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艰难体验来形容改革之难和行政化之害的。他说:教学楼楼顶漏水,朱清时想修楼,这么简单的事却拖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动静,政府解释说,按规定“这件事先得找人评估,评估之后招标,而且一定要有3家以上公司投标,中标之后签订合同,报深圳市财委申请经费。于是,一个教室漏水的问题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动工修缮。朱清时连买一台办公电脑都很费事,需要两个月左右的“走程序”——这个“程序”是什么?就是所谓的“阳光采购程序”。

只有在比较中才更凸显出“阳光采购”的荒诞和荒唐,一边是对政府内部人毫不设防,根本起不到财政约束的作用,部门和官员让人瞠目结舌的花花轿地毫无障碍,再荒诞的采购都能一路绿灯地轻松获得审批;一边是对政府外部人如防大“盗”,教育改革着想做点事儿却寸步难行,教学楼修个漏洞、买台办公电脑、申请点经费比登天还难,僵化繁琐的行政程序和“脸色难看”的官僚成为难以逾越的阻碍。这种鲜明的对比虽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却都是发生在“阳光采购”的制度语境下。

朱清时的遭遇不是个案,而是许多地方的改革者和需要政府拨款的校长们都遇到过的问题,审批之难难于上青天,盖个章一般都得跑几个月。“采购天价U盘”更不是个案,从近段时间频频曝光的采购腐败可以看到。这样的对比正暴露出“阳光采购”最大的制度性失败:防不住最该防的人,却成功地防住了最不该防的人。成功地限制住了像朱清时这样的改革者,却让“天价U盘”、“天价电脑”、“天价按摩椅”毫无障碍。

阳光采购“最该防的”是哪些人呢?正是掌握着权力资源、最有可能滥用权力去自肥的政府内部人士,他们习惯了财政供养和享受各种福利,习惯了乱花纳税人的钱肥一己之私,也习惯了通过各种名义沾公家的便宜。花别人的钱办事,他们有着天然的利益驱动将此置换为“为自己办事”,“内部人”的身份优势也使他们有这样的便利,所以他们“最该防”,设计制度时应将他们假设为“一个对财政观虎视眈眈的魔鬼”,像“贼”一样防着他们。“最不该防”的是那些手中无权的人,没有可用来寻租的权力,他们根本没有腐败的机会和可能,比如像朱清时这样一个筹办中的民校、受到董事会约束、由董事会选出来的校长,他办公室添置一台电脑,能发生多大的采购腐败呢?

其实,“阳光采购”的制度初衷正是为了防“最该防”的政府官员。正是政府部门一系列黑箱中的采购腐败催生了这个制度,可在现实执行中,却像许多其他制度一样最终异化为“防民不防官”。为何会有这种异化?关键在于这样的制度始终摆脱不了那个监督的悖论,负责监管和审批采购的人,他们往往能从采购腐败中获益,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给自己审批,自己给自己发一台天价U盘,他们有什么理由去拒绝这样的采购?所以,“阳光采购”对内部人完全不设防。可内外有别,一旦面对的是像朱清时这样的外部人时,这套制度就以百倍的严厉开始生效了,因为朱清时所做的虽然有利于公益,却无利于官员私益,制度就会成为他们弄异权威的工具。

“僵化”对于制度其实不是贬义词,很多时候他是“原则”的表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刚性标准对谁都一样,谁都要走同样的严格程序——如果原则是平等的,则“僵化”是制度的一种美德,那朱清时没什么可抱怨的。可现实是,官民有别,防民不防官,内部人怎么乱花钱都可以,外人花一分钱都要跑断腿。面对一路绿灯的“天价U盘”,困于僵化程序的朱清时情何以堪?

什么是坏制度?挡住改革者朱清时却挡不住天价U盘的制度就是最坏的制度。

降基尼系数须首先瞄准不合理房价

谢昱航

重庆在全国地方政府中率先将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二五”期间,将瞄准缩小“三大差距”,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速“共同富裕”,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新京报》1月10日)

中国贫富悬殊呈日趋扩大之势,近几年速度更是惊人。而细察贫富分化的原因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推手,就是不合理的房价。

近段时间,媒体报道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的同时,也不断报出从事农产品经营的菜贩们生活维艰的新闻。比如,河南一对夫妻在北京卖菜一年,年收入只有1.5万元左右,孩子父母都在老家,却不敢轻易回去,光往返路费,就足以让他们为难。类似“一个西安菜贩,两年没攒下一分钱”、“菜价高企菜贩未得利,卖菜维生小贩选择回乡”之类的新闻,媒体常有报道。

菜贩们起早贪黑,终日忙碌,可是,他们挣的钱,大都变成了别人的资产性收入。事实上,这样终日辛苦却为他人忙的,不光菜贩,还有很多要租房经营或居住的人。1月9日,广州团校发布广州青年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广州青年平均月收入3163.45元,35%的青年成为“月光族”。为什么那么多人成为“月光族”,原因不难推断。

近几年房价一路狂奔,购房价和租房价互相借力,互相推动,你方罢罢我登场,不断上演涨价好戏。在房价高企的背后,是人群的分化,一部分有房产的人,借助资产性收入,轻易地提高着生活条件;而没有房产的人,则要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为有房者打工上。

身边有一个现实的例子。同事A君和B君2005年硕士毕业一同进入北京一家单位,收入一样。A君因为家里能提供一些资助,很快买了一套房子;B君因为家穷,购房计划只能推迟。到了2010,A君总价40多万元买的房子,一下子涨到200多万元,成

房产税的可疑逻辑

徐冰

房产税之于中国的现实越来越像一个符号,其能否对地产调控达至预期效果至今疑窦丛生,与其说房产税承载了地产调控的众望,不如说它代表了坚持要将其推出来的某种意志。

据新华网报道,财政部已经原则同意重庆开征商品房房产税,具体实施方案由地方政府制订,报财政部备案。重庆市正抓紧完善相关方案,有望在今年一季度出台文件开征高档商品房房产税。

重庆开征房产税具有标志意义。标志之一,是这个改头换面的新税种尽管面临巨大争议,但却终究到来;标志之二,它能否实现人们的良好愿望,发挥出地产调控也即降低房价的作用;标志之三,它能否用另一个稳定的财政来源,促使政府放弃或者减少对卖地财政的依赖。

从全国地产市场的格局来看,房产税

尚存许多疑问。而重庆立志做第一个吃螃蟹者,在之于重庆地产市场的效果尚难窥下结论的情况下,只能暂时服膺重庆的勇气。

在地产调控的全国高压之中,重庆对于房产税尤为青睐,多次表示要做全国先行者的决心,给人印象深刻得几近惊讶。某种程度上,其“堵抢眼”的决绝姿态,遮蔽了该税种之于重庆民生和现实市场的分析。至今,我们也未见到房产税对于重庆经济和地产市场的相关分析报告。

而从媒体所透露的重庆版本的房产税方案看,先对别墅、200平方米以上的“大房子”和评估价值超过主城区平均售价3倍以上的住房开征房产税,看似打击炒作,其实依然留有后门。难道低于这个标准的就没有炒作?尤其让人生疑的在于,重庆的开征标准,矛头直指所谓的“富人”,不言而喻地暗示了政策打击的重点。其客观效应,不仅在于强化乃至固化了社会对于“阶层”的认识,更在于将社会情绪焦点转移。同时,也

能600元租大宅,我也会转变观念

普嘉

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在“幸福广东”的讨论中说,“我认为,我们的观念要转变,从有住房变成有房住,我工作了20多年,还没买房,现在住的是市政府的宿舍,在珠江帝景130多万平米,每月交租600元,当然,政府会补贴一部分房租。”(新华网1月7日)

廉租房月租费77元事件正处于“辟谣”的敏感期,广州市市长的这番话出自正规来源,就打消了自己是不是在传播谣言的顾虑。事实上,我相信广州市长的廉洁,也相信他说这番话的诚意,发自肺腑地用切身经历来支持“从有住房变成有房住”的观念转变。问题在于,作为发达地区省会城市的市长,他对这座城市体验并不具有普遍性,不能代表普通百姓的感受,高官的住房福利去谈不可租房不要买房的观念转变,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600元就能租豪宅并非人人都能享受的政府补助。

就拿万市长所居住的“珠江帝景”来说吧,说是宿舍,你可千万不能和单位宿舍、学生宿舍等群住蜗居相提并论。我上网搜

了一下,光看照片该社区就富丽堂皇,十分气派。据介绍,珠江帝景三面环水,北傍珠江,东邻黄埔涌,坐享2公里沿江翠堤,拥览市区最开阔壮丽的江景。社区规划由地标甲级写字楼(与CBD的各地标相呼应)、五星级酒店与会所、酒店式服务公寓、高档商住公寓、高档住宅相配合的综合性大型高档社区,整个社区规划设计主要采用现代手法诠释欧式古典风格,社区里还有广州首个投资逾2亿元超大型酒店式豪华会所……按照网易地产广州站最新报价,珠江帝景每平方米售价35000元。

相信得知连市长也住珠江帝景的消息,这个社区还会升值,要知道这可比与明星为邻有好处多了,至少大官住的地方治安有保障,也不太可能发生强制暴力拆迁。且不说万市长住130万平挺宽敞,单就市价上的每平方米35000元以每月租金600元来算,就够住1750天。地方政府每届任期不过四年,4年不过1460天,一个任期内的租金,连“珠江帝景”一平方米售价都不到。

老百姓难道心甘情愿地当银行贷款冤大头?还有很多人付不起首付当房奴的

总统府商业化缘于历史敬意的缺失

胡小裘

南京总统府是中国最大的近代史遗址博物馆,600年来,这里见证了中国近代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因而也成为外地游客必游之地。然而,近两年来,游客发现,这里许多遗址变成了竞相叫卖的商场。而且,这些商业开发与文物之间也缺乏必要的关联,像江南云锦、南京桂花鸭、雨花石等商品,在南京任一景点都能买到。商业覆盖文物的结果,使得游客的旅游体验十分糟糕,且不论寻幽探古已经没有任何可能,就连到此接受基本的近代史教育,感受历史的天空中曾经发生过哪些人事,也变得十分艰难。

其时,总统府管理单位没有披露商业开发的具体收益,也没有披露这部分收益到底是如何用于总统府文物保护的。至少就目前游客所见到情形看,商品泛滥的同时,文物保护似乎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不仅如此,与近代史相关的文物陈列和展览反而严重缩减。而在这方面,管理单位本可以大有作为。南京总统府自明朝肇建,

为能够顺利地让房产税落地,找到了社会心理的突破口——这究竟是一个出于市场考虑的税种,还是针对社会矛盾的税种?

一直以来,对于房产税迟迟难以推出,总是有论者将原因归结为既得利益集团阻挠。这种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有其极不严肃之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存在,关键是如何认识既得利益集团,并如何去约束既得利益集团。所谓无代表不纳税,而我们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如何制衡无代表也要纳税的进退失据。在一个供需矛盾失衡的卖方市场上,房产税一旦推出,真的可以出现希望中的房价降低吗?供应量不增加,如何规避税负转嫁?

除非在重庆人和外地人之间建立森严的壁垒,并显著加大对于重庆人的住房供应,房产税才会对重庆的房价产生显著效应。否则,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在供应跟不上需求的情况下,房产税降房价还需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资格都没有。还有的人省吃俭用上房奴还暗自高兴,当初买对了,现在升值了,大赚一笔。尽管如此,老百姓也会比较算计每月房贷和租金,住同样的房子,月租要是远远小于每月还贷,难道还不转变观念,非要买房不成?要知道在中国,你买的不动产也并非“恒产”,不过70年的土地使用权,你的房子有留给子孙孙的可能性吗?能在有生之年住满70年还真该谢天谢地。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在去年的地产年会上透露:“中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住房在未来15年到20年将拆了重建。”

租房还得遇上个好房东,不苛刻不刁蛮,不会随意加价,不会订制不平等条约,不会蛮不讲理地让你卷铺盖走人。从未有过房东不赚钱倒贴房东的道理,市市长的政府宿舍“房东”可谓与众不同。然而老百姓都还在指望政府这个“房东”不单要对官员好,还要为老百姓办实事,积极调控房价,让人人有房住,想租房的人租得起,想买房的买得起。万市长,老百姓去哪裡找这样的好房东呢?不要忘记某种程度上你也算“房东”。

历清朝、太平天国、民国等政权更迭,一直处于权力运作的枢机,见证了一幕幕宏大的历史大剧,公众对此一直保持着很浓烈的兴趣。此前,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管理与建设办公室行政部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总统府是个遗址,文物很少。”这样的认识毋宁说是为商业泛滥开脱,还不如说是对历史的严重误读。总统府本就是文物,何来“很少”的说法?

早在抗战时期,面对民族深重的灾难,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其著作《国史大纲》前面深情写下,“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今人谢泳先生更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首先是建立在他们有权了解本国历史真相的前提下。无论是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还是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都需要有所凭仗。而像南京总统府这样的历史遗址,正是今天我们进入历史、了解真相的最便捷路径,任何人不应该去掩盖、隐藏这样的路径。



团购乱象

近日,网络团购因其价格优势受到欢迎,央视日前曝光了团购网站虚假低折扣及操纵团购人数等现象。据报道,曾有网友团购iPhone4后却收到扑克牌或用过的化妆品,而在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后,也无法联系到团购网站。(央视1月10日)

漫画:徐简

暑假缩水后的长官意志

校园来信

余绮

日前,收到一个朋友的短信,身为高中教师的他跟我诉苦,说学校刚公布了2011年的校历,江苏省的高中暑假又是7月13日才放,比小学初中整整晚放半个月。这个事,从2007年以来,我年年都要听朋友抱怨一次。这次更好,提前半年就开始了。

2007年6月底,江苏省教育厅发文,高中改为7月13日放假。没有对推迟放假做任何解释,通知就是命令,命令就得执行。于是,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王斌秦先生,再一次成为全省100多万高中师生的众矢之的。

写此文时,我上网百度了一下王斌秦的简历,百度上一段文字赫然然:“江苏省省教育厅厅长、前党组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王斌秦……在任期间,因其在高考制度改革上的一些措施,受到广泛批评。江苏高考方案变化频繁,十年变脸四次,使得学生、家长、学校饱受折腾。”为官一任,广为时人所诟病,竟留下如此评价,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也是执政者足当引以以为戒的。

然而,王斌秦虽已卸任,他在任时所留下的弊政,桩桩件件尚在执行。其中,不仅包括江苏省的高考制度这样繁

畸形的效率源自主人的缺位

汪强

上周的《南方周末》“开年十大猜”第一猜为“房产税会全国开征吗”?河南三门峡市人大代表孙振军作出肯定回答,理由是:“多少年了,一直有两件事办得最有效率:1.给官员涨工资;2.向老百姓摊派与征税。”

凡是爱国情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孙振军此言不谬。三年前各地给公务员加所谓阳光工资,公务员的收入差不多翻了一番,可此前老百姓没有听到一点动静。说加很快就加了,多高的效率?与之相反,给老百姓加工资,常常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两相比较,高低立见。况且,不仅有个时间问题,还有个增加工资的幅度问题。一位退休处级官员在一次会议上说,那年他每月增加的生活补贴为3000多元(在职公务员发阳光工资,退休公务员发的叫生活补贴),而普通工人每月增加的退休金为100多元。退休公务员一次增加的收入抵得上退休工人加20多元。

同时向老百姓摊派与征税,确实是高效率的。这次增设房产税,还能反复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已经是够温柔的了。而一些摊派,根本就是没商量,干脆从你工资中扣除。

有高效率也就有低效率。模仿孙振军的话,似乎可以这么说:多少年了,一直有两件事办得最没效率:1.触动官员们的既得利益;2.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或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比如,说公车改革说

难的大问题,还有高中暑假无故延迟半个月这样的小细节。

不过,这个细节说小,也不能算小。它毕竟关乎100多万高中师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暑暑炎炎,身心两倦,心理和生理上双重的影响,不可谓不是一种折磨。比如我这位朋友,每年都会为这个郁闷的暑假而纠结。眼看着人家都放假了,而自己还要继续准点上下班,正常坐班,早晚辅导,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监考阅卷挥汗如雨,脾气怨气交相累积,简直都要发了脾气。教师尚如此,学生则更是,学期无端延长半月,却不会多学半点新知识,在江南暑气最酷之时,反复训练题目,一遍遍模拟改错,完成了一架架应试机器,苦毒之甚,无以攀状。

大约在主管部门大人们的脑袋里,一直就装着这样的观念:抓教育就要抓分数,有分数才能有政绩。抓分数就要抓时间,抓时间则必须打消耗战。于是乎,在教师和学生的休息时间上打歪主意,动点手脚,也就理所当然了。在他们的心目中,何曾把师生的身心健康当做“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呢?学校是个执行命令的衙门,教师是完成指令的衙役,而学生就是为了完成指标的在押犯人!在粗鄙蛮横的管理下,敞亮、欢乐、明亮、自由……美好的东西愈来愈少,“教育”将日益浸泡在怨毒之中,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遥想将来,实在不容乐观。

了20多年,越改公车消费越高,至今也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来。而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这个事说的时间也不短了,至今也没有听到让普通工薪阶层兴奋的消息。

这两个高效率与低效率,应该说是畸形的效率。按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说法,那要加工资,要提高收入,应该是普通老百姓领先一步;应为社会多作些贡献,应该是公务员抢先一步。不说了,这个要求太高了,要求公务员如此做,简直是天方夜谭了。那我们何以退一步,让公务员与天下同忧同乐,这个要求不算高吧?事实上,一些国家就是这么做的,公务员的收入与老百姓的收入大同小异,公务员也要随之下降。

我们这里为何会出现如此畸形的效率?根本原因在于利益分配上,主人做不了主。养老保险双轨制早已惹众怒,有关方面也承认这是不合理,要进行改革,要取消双轨制。可是,又有人又说,这是历史形成的问题,解决问题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一个时间。要有多长时间?没有说!从目前的情形看,要5年内解决不了问题。10年内解决问题也很危险。为何在这个问题上效率如此低下?原来,能决定这项改革如何进行、什么时间进行的是官员,老百姓是做不了主的。试想,如果由人民来决定退休双轨制的存留,解决这一问题会如此低效率吗?